

## ●经济社会发展●

# 论工业偏斜政策 与农业发展滞后

许经勇

我国是在经济异常落后、自然经济比重很大、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这就决定了不可能选择协调、平衡、缓慢增长的发展道路。对于经济异常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倘若选择协调的、平衡的缓慢经济增长道路,必须经历极其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进入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为了尽量缩短这个过程,在其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必须暂时牺牲分配效率,暂时牺牲消费者利益,人为地压低农产品、原材料、能源、交通等价格,以便迅速动员经济力量,较快地积累起工业化资金。由此可见,不平衡的、不协调的迅速增长,必然是一种指令性、强制性的经济增长。把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政府部门,为了优先发展生产生产资料的经济部门,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条件),就必须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抑制消费者的消费自由,抑制消费水平,排斥市场的作用,以便迅速地提高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积累水平。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建国初期,选择工业化优先、高速度增长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从而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正是依靠工业偏斜政策,一方面通过强制性手段成功地从农业中积累了工业化所必需的原始资金,使工业的投资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52年至1979年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重工业占53.9%,农业仅占12%;另一方面通过重工业自身的循环,创造了不断扩张的社会需求,从而克服了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着的投资不足和需求不足两大难题。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农业——工业国乃至工业——农业国转变,建立起现代民族工业体系,并为国民经济现代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但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缺陷和问题。诸如,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从农业提取的积累率过高,抽走的资金量过多,又把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导致农业生产手段长期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极其缓慢,城乡、工农关系很不协调;由于过分地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动力,把农业变成基础脆弱的经济。又如,长期吃偏斜饭的国家工业,在原料、能源、食物价格和汇率、工资扭曲以及垄断的就业制度和刚性的福利制度下,缺乏成本意识和竞争意识,从而破坏了企业的内在动力机制,使之变成了低效率经济。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温饱问题引起的。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生产粮食的农民还不可能完全解决自身的温饱,城镇居民的生活也较为清苦。这种局面如果不尽快改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而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就得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

节——农业开始。自1979年起，国家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适当抑制农业收入的外流，这不仅明显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而且相应地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后劲。紧接着又在否定农村人民公社化模式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我国农村的微观经济基础。这就必然要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我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是以重新构造微观经济模式，增强微观经济活力，强化微观经济约束为目标的。在微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通过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落实权、责、利相统一的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微观经济活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我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使承包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这就必然强化市场机制对承包户经济行为的支配作用，农民为适应市场需求而生产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市场的发育和健全，以及市场机制的形式，越来越上升为主要矛盾。

随着以市场取向为核心的我国农产品购销与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引起国民收入在农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再分配，逐步弱化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截取农业收入的能力。伴随着农业向城市工业收入转移的逐步减少，客观上要求城市工业体制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体制，都必须跟着相应地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减少了农业收入的隐性损失，而这种意义上的农民收入增加，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虽然当时国家以收缩财政，降低工业发展速度等消极办法应付过去，但由于城市工业的效率与效益没有相应地提高，国家财政因此而减少的收入，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一旦城市工业转入正常发展之后，其所必需的投资需求就无法得到相应的保证。不仅如此，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城市职工的消费水平也随之相应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既要保证城市工业的发展，又要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只能重新加强对农业提供资金原始积累的依赖。这必然障碍着城乡经济改革的深化。

客观地说，我国传统体制的主要缺陷并不在于超前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选择了集权式经济管理体制，与此相联系的是低下企业经济效益。在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缺乏必要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限制了企业职工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更谈不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工业的较高速度增长，国家不仅无力改变对农业提供高资金原始积累的依赖，反而使这种依赖长其化、固定化。这是导致农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农业的负担超过极限，必然出现停滞、徘徊的局面，而这又会反过来制约工业的发展。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

工业偏斜政策不仅表现在城市工业偏斜，而且表现在农村工业偏斜。我国农业所承担的资金原始积累任务相当繁重。即不仅要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大量的积累资金，而且要为农村工业化提供大量的启动资金。当然，农业为农村工业化提供的原始积累，和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在运行机制上是有所不同的。即后者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指令控制；前者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市场机制。也就是说，前者是以商品货币关系为条件、以市场机制为依托的资金积累机制。因为农业为农村工业化提供大量的启动资金。当然，农业为农村工业化提供的原始积累，与农业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的原始积累不同，它反映着农民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所必然出现的价值观念、积累观念的深刻变化。

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根据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重

新构造我国农村微观经济主体,使其对生产要素有更大的支配权,对劳动时间有更大的自主权,为资金、物资、劳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重新组合,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1985年开始的农产品购销体制的重大改革之后,受比较利益的支配,出现资金从农业领域向农村工业领域以及其他非农业领域转移的态势,使得农民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提高农产品价格而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和所增加的收益,不能大量地投入农业生产领域,并一度出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80年代以年均<sup>2</sup>9.1%的速度增长),和农业相对萎缩的局面。这具体表现在:各种形式的农业投入出现下降的趋势。就农户投入来说,农业固定资产占农户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1984年为<sup>6</sup>2.3%,1985年为53.1%,1989年为53.7%;就集体投入来说,农业投资中,集体所占的比重,1981年为40%,1986年为8.1%,至1989年也没有超过10%;就国家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说,1979年为12.6%,1987年为7.3%,1989年为8.3%,最低的年份曾降到3%;农业信贷资金占农村信贷资金的比重,1989年为30.7%,1987年为23.5%,目前不到10%。出现了农民不愿投入,集体无力投入,国家舍不得投入的状况。

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投入不足,是因为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农业比较利益所以偏低,是因为农产品价格偏低。似乎只要把农产品价格提高到反映农产品社会价值的水平上,就可以解决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问题。这是对农业再生产特点缺乏应有的认识。农产品生产与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再生产是与自然再生产相交织。农产品生产时间,不仅包括劳动持续的时间,而且包括劳动时间以外自然力独立发生作用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产品的物质(即使用价值)生产率,要比其他非农产业高得多。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直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来说,——农业比所有其他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高。”<sup>①</sup>但是,“价值,从而还有剩余价值,并不等于生产阶段持续的时间,而是等于这个生产阶段内耗费的劳动时间,包括物化劳动时间和活劳动时间。只有活劳动时间——而且按照它同物化劳动时间之比——能够创造剩余价值”,“从这方面看,例如农业,比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低(这里是指价值生产的生产率。”<sup>②</sup>正因为这个缘故,在产业发展史上,“农业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于资本以前的或同它自身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那些生产方式之中。农村副业,如纺纱、织布等,必须弥补这里所存在的使用劳动时间方面的限制——这些中断所包含的限制。”<sup>③</sup>1990年全国的农户数发展到2.16亿户,平均每户耕地下降到8.5亩,平均每个劳动力用在耕地上的劳动日,一年不到100个,目前每个劳动日的平均纯收入约6元,一年的农业收入也不过500多元。即使把目前的粮食价格再提高一倍,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年收入也不过1000元,和工商业200个劳动日的年收入相比,相差甚远。这就不难理解,在当今世界上,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农民的兼业化现象相当普遍。即使是那些农业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为了稳定农民(尤其是粮农)的生产积极性,政府往往给予巨额的财政补贴,其补贴额有时超过农民的净收入。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把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到反映农产品社会价值的水平上,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问题。

我国农业发展滞后问题,说到底是个投资的问题。如何把我国极其有限的资金,在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之间,作出适当的、合理的分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经济难题。对

于我国来说,不仅农业落后,工业也不发达,在迅速发展农业和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双重目标权衡中,农业问题成了一个既不可能忽视又无力完全解决的难题。建国4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一经济难题,但始终没有找到适当的方式和比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较低,一旦急剧减少农业通过各种形式向工业所提供的原始积累,就会严重地威胁工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如何找到一条既能使农业的待遇有所改善,又不致于损害工业的发展,从而选择对两者都是有利的路子。

建国40多年来,我国曾经进行过几次规模较大的经济调整,每一次经济调整都是因为农业出了问题,严重地阻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即农业出了问题就抓农业,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农业形势好转又忽视农业,减少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始终不能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尽管经过近三年的治理整顿,也没有把工农两大部门的失调状况完全改变过来。虽然从表面上看来,1990年与1988年相比,国家对农业系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28.6%,然而这是在基数大为减少了基础上增长的,它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由2.5%上场到2.8%,只增长0.3个百分点。这与以往每次经济调整中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有很大的不同。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低点。造成上述状况,既有主观认识上的问题(即没有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也有客观条件的制约。这就是我国工业还没有发展到完全依靠自身积累的阶段,城市工业还需要农业继续为其提供原始积累(1989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绝对值达1019.86亿元),因而在资金分配上还不可能真正做到向农业倾斜,或者说,只能短时间地向农业倾斜,这必然导致农业的周期性徘徊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过去—度被称为“世界粮仓”的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反而从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粮食。要揭开这一谜底,必须探寻现代经济增长的条件与规律。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非农业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农业部门的资源,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具有客观必然性。在这种逆境下,要想增加农业劳动者人均占有的资金量,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资金投入,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特别是迅速发展着的制造业,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其所需要的资金量是很大的,而且其中的一部分是以不等价交换和强制征税的形式,从农业部门中转移过来的。这就使得已经偏低的农业比较利益日趋下降,并大大地削弱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后劲。这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当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增长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农业资源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才会呈下降趋势。而当非农产业(特别是城市工业)增长到—定程度,其后续发展便主要是依靠该产业部门自身的努力与积累,即不再依靠农业资源与“农业剩余”的流入。并有足够的工业化积累资金,用于对农业的投入与补偿。这不仅有利于补偿偏低的农业比较利益,而且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当今工业化国家为什么要对农业实行必要的财政补贴,该国的农业为什么具有高生产率的重要原因。

根据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农养工阶段。即农业为工业无偿提供积累资金阶段。二是农业与工业均等发展阶段。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互不提供资金,各自形成的剩余不向对方转移,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等价交换。三是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高度发达的工业所形成的

# 利用证券市场筹措外资的若干思考

游炳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已超过800亿美元,部分弥补了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对引进先进技术和增强我国综合国力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从利用外资的构成来看,在国际通行的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证券筹资三大融资工具中,长期以来我国偏重于对外借款,对外证券融资所占比重不足5%,利用股票筹资则刚刚起步。这不能不说是利用外资工作的重大缺陷。笔者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应顺应世界各国对外投资的新趋势,及时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强化证券尤其是股票吸纳外资的功能。

## 一、证券投资:世界各国对外投资的新方式

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金融管制的逐渐放松,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相继把股票和债券作为对外融资和对外投资的重要手段。以日本为例,70年代以前,日本长期资本输出大多以非证券投资为主,1961年对外证券投资额仅为100万美元;到1977年,该国对证券投资额首次超过对外直接投资额,其后则一直快速成长,已成为对外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海外投资者也照样透过日本的金融市场买卖日本企业股票。1980年海外投资者买卖日本企业的股票占日本股票交易额的比重为10%左右,1985年上升到17.4%。据悉,世界各国销售排名前200位的大公司中,几乎有40%以上的公司通过本国和外国证券市场对外直接融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新加坡,进入80年代以后,在海外的证券投资以及其他金融工具投资不断增加,间接投资已超过了直接投资。1989年新加坡对外投资中,证券投资占28.6%,直接投资占20.8%。该国购买海外企业的股票和债券已遍及世界各个大洲。

资金,除了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有一定量的剩余可用来反哺农业。我国现阶段的国家工业,正处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或者说,即将进入第二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工农两大部门的产值比例,已经由早期的3:7转变为目前的7:3,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已经形成自我积累为主的能力。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创造条件,结束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原始积累的历史,逐步实现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但还没有条件实行向农业持续倾斜的政策,因而还不可能很快地把农业改造成为高生产率、高经济效益的产业。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注: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下册,第181—182页

(本文作者: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责任编辑:刘铮)